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叢書

漢語方言語音史研究
與歷史層次分析法

陳忠敏 著



中華書局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叢書

漢語方言語音史研究
與歷史層次分析法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数据

漢語方言語音史研究與歷史層次分析法 / 陳忠敏
著. —北京:中華書局,2013.7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叢書)

ISBN 978 - 7 - 101 - 09368 - 1

I .漢… II .陳… III .漢語方言 - 語言史 - 研究
IV .H17-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數據核字(2013)第 107569 號

書 名 漢語方言語音史研究與歷史層次分析法

著 者 陳忠敏

叢 書 名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叢書

責任編輯 俞國林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張 22 $\frac{3}{4}$ 插頁 2 字數 370 千字

印 數 1-15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101 - 09368 - 1

定 價 69.00 元

“漢語史研究叢書”總序

浙江大學的漢語史研究中心是1999年成立的,已經近十年了,而可追溯的漢語史研究的歷史則相當久遠。中心的大部分成員1998年以前屬於杭州大學中文系古漢語教研室,而古漢語研究一直是杭大中文系的優長學科,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優良的傳統。杭州大學中文系的前身是之江大學文理學院國文系(1920年成立)和浙江大學文理學院國文系(1928年成立)。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學者張相、馬叙倫、任銘善、蔣禮鴻等先生先後在兩校任教,開創了我校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領域,筭路藍縷,功不可沒。

1952年,由浙江大學分出的師範學院、文學院和理學院的一部分與之江大學文理學院合併,組建了浙江師範學院。1958年,浙江師範學院與新成立的杭州大學合併,定名為杭州大學。1961年,在中國科學院浙江分院語言文學研究室的基礎上,成立了杭州大學語言文學研究室,聚集了一批從事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各擅勝場,成果迭出,如姜亮夫《屈原賦校注》、《楚辭通故》,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義府續貂》,蔣禮鴻、任銘善《古漢語通論》等,都是名聞遐邇的力作,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隨着“文革”的結束,學術事業中興,杭州大學中文系的漢語史研究興旺發達,生機勃勃。老一輩學者姜亮夫、蔣禮鴻先生等老當益壯,中青年學者郭在貽教授等脫穎而出,在楚辭學、敦煌語言文字學、俗語詞研究等領域成就斐然,享譽海內外。1986年,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定,增設杭州大學漢語史專業為博士點,蔣禮鴻和郭在貽兩位先生被評定為博士生導師。此後,祝鴻燾、黃金貴教授相繼增列為博士生導師,一批年輕的博士先後加盟。漢語史研究成為杭州大學最具特色的學科之一,人才濟濟。姜、蔣、郭等前輩學者不僅自己辛勤耕耘,成果豐碩,在學界具有重要影響,同時也承擔了教書育人的重任,培養了一大批有潛力的年輕學子,目前活躍在漢語史學界的一批中青年學者,如治中古漢語的王雲路、方一新、顏洽茂、梁曉虹,治近代漢語(敦煌語言文字學)的張涌泉、黃

征、蔣冀騁，治文字訓詁的傅傑、殷寄明、任繼昉等，都出自幾位先生的門下。

1998年9月，在原浙江大學、杭州大學等四校的基礎上合併組建了新浙江大學。以中文系古漢語、現代漢語兩個教研室為基礎，組建成立了浙江大學漢語言研究所。1999年10月，以漢語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為主體，聯合古籍所等單位，組建成立了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2000年12月，漢語史研究中心正式入選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心依託浙江省重點學科漢語言文字學、全國重點學科中國古典文獻學和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博士點及博士後流動站，側重於中古漢語、近代漢語及訓詁文字學研究，特色鮮明，隊伍整齊。

漢語史研究是很有意義的事業。通過漢語史的研究，我們不僅可以對漢語的發展歷史有比較全面深入的瞭解，洞悉現代漢語的來龍去脈，還能夠幫助解決中國古代文史哲等相關學科中存在的有關語言文字方面的許多實際問題，更好地繼承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弘揚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

中心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科研放在至關重要的位置上，以項目特別是重大項目為紐帶，展開學術研究。迄今為止，已經承擔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4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6項，還有多項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項目、教育部全國高校古委會資助項目等課題研究。為了體現出成果、出人才的基地建設宗旨，展示中心成員在漢語史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我們打算從今年起，在三五年內，陸續出版一套“漢語史研究叢書”，計劃共出三輯，每輯6-7種，共約20種，分批推出。列入本套叢書的，主要是中心研究人員的學術專著，也有幾篇較為優秀的博士學位論文和博士後出站報告，這些博士論文或出站報告，都經過了學界同行專家的匿名評審並得到了較高的評價。叢書內容包括方言、語音、語法、詞彙訓詁等漢語史研究的相關領域。這些著作，從一個側面，展示了漢語史研究中心專職人員的整體力量，其中，年輕一代的成果，尤其值得關注。

應該說明的是，中心部分重大項目的最終成果，如《敦煌經部文獻合集》、《中古漢語詞彙史》、《中古近代漢語詞彙學》、《古代同義詞詞典》等已經或將要在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等出版社出版，中心部分成員的其他成果，也已列入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出版，這些都不在本叢書的出版計劃之列。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能有幸入選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發展到今天，飲水思源，應該歸功於老一輩學者為我們打下的良好基礎，歸功於給了我們許多支持和幫助的學界前輩；中華書局願意出版這套沒有什麼經濟效益的

學術著作，各位責編認真負責地幫助我們把關，令人感動。在此，謹對所有給予漢語史研究中心及這套叢書各種關心支持的先生和朋友們，一併表示誠摯的謝意。

當下社會，經濟發展了，生活改善了，但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產生了很多新的問題。高校也非世外桃源，急功近利的陰影始終不散，學術環境不如人意——這些都無庸諱言。但是，一個真正的讀書人，無論世事如何變化，應始終保持內心的恬淡，不忘對學術的追求。令人欣慰的是，在這喧囂的塵世，中心的學術同人始終執着地做着教學、科研和培養人才的工作，默默耕耘，矢志不渝，這套叢書的出版就是很好的證明。在此，我要感謝中心的每一位老師，中心的成長和發展，離不開大家的支持。當然，叢書肯定還存在着這樣那樣的問題，盼望着得到學界方家的批評和指正。

方一新

2008年11月27日於浙大西溪校區

丁 序

1999年第六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在香港科技大學召開，會議是我主辦的，忠敏送來一篇論文：《方言間的層次對應——以吳閩語虞韻讀音爲例》；早一年，台灣召開第六屆中國境內語言及語言學國際研討會，忠敏也有一篇論文：《吳語及鄰近方言魚韻的讀音層次——兼論“金陵切韻”魚韻的音值》。這兩篇論文差不多同時完成，後來也都正式發表。給漢語音韻學上“魚虞”兩韻的問題做了一個詳盡的注解，更重要的是指出複雜的層次對應問題，這也是第一次有人指出虞韻字在吳語跟閩語中各有三個對應的層次。

從那以後，忠敏圍繞著層次的主題又寫了許多篇論文，有的從理論的角度出發，探討層次的鑒定、分析方法、時間性、對應關係等等；有的從實例檢看漢語方言中歷史層次的種種現象。用他自己的話說：“根據漢語方言演變的特點提出一中心多層次的漢語方言演變觀，並提出與此演變相配的歷史層次分析法。”如果我說忠敏是語言學家對漢語層次觀察最廣、耕耘最深、因而建立起理論體系的一位學者，應非虛譽！

現在他把這些論文收在一起，重新整理、編排，並加上兩章評介西方歷史語言學界研究音變的歷史跟理論，寫成一本專著。不僅是他個人把他對這個專題的研究作一個總結，同時也是給年輕的語言學者指點一條新路。

層次的研究何以重要？因爲在漢語以外的語言極少發現這個現象，如果能尋繹出脈絡，建立起理論，對一般語言學會有重要的貢獻。忠敏提出的“一中心多層次”說就是往這個方向邁進了一大步。

現在談一點個人的意見，忠敏的說法有一個前提：“一層一層移民潮帶來的是歷代中原地區的口語，——（隋朝以後）以中原地區官話爲標準的讀書音又得以向全國乃至東亞、東南亞推廣開去。”所以他說的“一中心”就是“中原官話”，而我覺得所謂“中原官話”只是一個統稱，本身也有方言變異、變動不居的特性，從隋唐時代的口語到《中原音韻》時代的口語，變化相當大；讀書音更是複雜，可

能以另一個方言的白話作文讀,或以另一個方言的文讀作白話,因此“一中心”的概念還值得進一步商榷。

我無意在這裏跟忠敏辯論,儘管忠敏偶爾對我的一些說法提出異議,其實不同的意見就是進步的動力。希望讀者讀這本書的時候能發現問題、深入思考、將來發展出自己不同的理論,那就是我們兩人共同的願望了。

丁邦新序

二零零八年舊曆中秋節於美國金山灣區千石齋

目 錄

序	1
---------	---

第一部分：歷史比較法與音變研究

第一章 音變研究的回顧和前瞻	3
第二章 印歐語研究與歷史比較法	44

第二部分：漢語方言演變模式以及歷史層次分析法

第三章 漢語方言演變史和歷史層次分析法	67
第四章 語音層次的定義和分析方法	93
第五章 論語音層次的時間性	122
第六章 論語音層次的對應	136
第七章 文白異讀與語音層次	155
第八章 語言的底層理論與底層分析法	188

第三部分：方言語音層次個案分析

第九章 論閩語魚韻的讀音層次	209
第十章 吳閩贛徽等方言魚韻的讀音層次 ——兼論“金陵切韻”魚韻的音值	232
第十一章 吳閩方言虞韻讀音層次	278
第十二章 閩南話齊韻的讀音層次	296
第十三章 吳閩贛方言效攝的讀音層次及其跟鄰近	

	方言的類型比較	314
第十四章	論吳語衢州片方言齊韻的今韻母讀音層次	331
第十五章	上海市區話舒聲陽調類合併的原因 ——層次音變研究	341
後記	353

第一部分 歷史比較法與音變研究

第一章 音變研究的回顧和前瞻

語言學作為獨立的學科分支是從十九世紀的歷史語言學開始的，而歷史語言學的中心和支柱是對於音變的研究，可以說沒有音變研究就沒有歷史語言學。本章全面回顧及檢討十九世紀以來音變研究理論以及方法的變遷，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今後音變研究的趨勢和方向。

無論是十九世紀開始的歷史語言學，還是以後的結構主義、轉換生成語言學，語言演變始終是他們研究和討論的一個重點，正像馬丁內(André Martinet)說的：即使我們不把語言學放入歷史學的範疇裏，語言演變原因的研究仍然是語言學討論中的一個焦點，因為如果我們不瞭解語言演變的原理，就無法談論什麼是語言以及語言的運作機制(Martinet 1952)。縱觀兩百年來音變研究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研究音變的三大取材：1，一種語言的歷史文獻(gross historical evidence)；2，親屬語言的語音比較(Language comparison)；3，共時平面的語音變異(language variations)。從今天的角度看，三種材料各有優劣，可以互相補充、互為印證。但是各個時期對三種材料的取舍是有所側重的，這種側重的背後是有特定的理論背景的。

第一節 二十世紀以前的歷史語言學對音變的研究

雖然歷史語言學的建立是在十九世紀，但是在十九世紀以前，人們對語言演變機制、原因、途徑早就有很多的探索，不過這種探索不能跟包坡(Franz Bopp)、格林姆(Jacob Grimm)、拉斯克(Rasmus Rask)的研究相比。我們以格林姆定律(Grimm's Law)為例(Grimm 1822)來說明這種區別：

非日爾曼語族				日爾曼語族		
p	t	k		f	θ	x/h
(b)	d	g	⇒	(p)	t	k
bh	dh	gh		b/β	d/ð	g/ɣ

非日爾曼的清不送氣塞音對應於日爾曼的擦音；非日爾曼的濁不送塞音氣對應於日爾曼的清不送氣塞音；非日爾曼的濁送氣塞音對應於日爾曼的濁塞音或濁擦音。後來認為後者是前者的演變結果。

格林姆的研究跟前人不同之處在於：第一，格林姆在他的文章裏列舉的古典語言之多是前人沒有的，他列舉到的古文獻語言有：梵文(Sanskrit)、希臘文(Greek)、拉丁文(Latin)、哥德文(Gothic)、古高地德文(Old High German)、立陶宛文(Lithuanian)、斯拉夫文(Slav)、古挪威文(Old Norse)等，幾乎把這一時期重要的印歐語古文獻語言都包括了，所以是名副其實的語言比較。第二，跟前人毫無系統、零星的舉例不同，格林姆在他的文章裏排列了大量的例子，比如要說明非日爾曼語與日爾曼語有 p—f 的對應，他幾乎把重要語言裏具有 p 或 f 的對應詞（其實就是以後所說的同源詞）全部列出。所以上述的對應是系統的對應，而不是個別詞的零星的巧合。第三，他已經注意到了所比較項目在詞首或詞中的區別，比如他說古哥德語缺少詞首的 p。第四，作為一個嚴謹的語言學家，他把不能解決的“例外”也統統列出，而正是這些例外為以後格拉斯曼(Hermann Grassmann)、維納爾(Karl Verner)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寶貴的素材。

整個十九世紀歷史語言學的語音演變研究是建立在發音學的基礎上的。格林姆雖然注意到了所比較項目在詞首、詞中的位置，但是他很少或根本没考慮到鄰近的音段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所以他無法解釋一些例外。格拉斯曼發現在格林姆的例外裏，梵文、希臘文送氣輔音不同時出現在一個詞裏，如表 1.01：

表 1.01

梵文	希臘文	哥德文	英文
bodha	peutha	biudan	bid 'to wake, become aware'
bandha		bindan	bind 'to bind'

按照格林姆定律，非日爾曼語與日爾曼語 bh—b; dh—d 的對應（希臘語已

變為相應的清塞音),如果梵文代表最原始的形式,那麼按照上述格林姆定律,梵文的 bodha, bandha 要對應哥德語的 piudan, pindan 才是,而不是文獻中的 biudan, bindan。所以格拉斯曼認為原始形式到梵文發生過送氣塞音的異化音變,一個詞裏後面的送氣成分使得前面的送氣成分消失:

* Ch... Ch > C... Ch

這就是格拉斯曼定律(Grassmann's Law)。而這種異化並不發生在日爾曼語裏,這樣格林姆所列的很多例外就變得規律了。格拉斯曼定律告訴我們研究音變不僅要看前後相鄰的音段,而且還要注意一個詞中非鄰近音段的相互作用。格林姆所列的最後一些例外經維納爾的研究,也得到了圓滿的解釋。維納爾增加了重音因素來解釋由格林姆定律所產生的最後一批例外,重音的位置在所對應的輔音前或後,它們的音變也會不同,如表 1.02:

表 1.02

拉丁文	梵文	哥德文	古英文	
<i>pater</i>	<i>pitá</i>	<i>fadar</i>	<i>fæder</i>	'father'
<i>māter</i>	<i>mātá</i>		<i>mōdor</i>	'mother'
<i>frāter</i>	<i>bhrātā</i>	<i>brōþar</i>	<i>brōþor</i>	'brother'

用公式表述為:

$$\begin{pmatrix} +\text{fric.} \\ -\text{voice} \end{pmatrix} > \begin{pmatrix} +\text{voice} \\ (\pm\text{stop}) \end{pmatrix} < \begin{pmatrix} +\text{voice} \\ -\text{acct.} \end{pmatrix} \text{---} \left\{ \begin{array}{l} [+ \text{voice}] \\ \# \end{array} \right\}$$

也就是說原始日爾曼語的擦音,如果符合下列三個條件,要濁化。第一,它不在詞首;第二,它前後兩個音段是濁的;第三,原始印歐語的重音不落在它前面的一個音段上。這就是著名的維納爾定律。根據維納爾定律,“father”“brother”在日爾曼語裏就會不同的音變結果,如表 1.03:

表 1.03

原始印歐語	梵文	格林姆定律	維納爾定律	哥德文	意義
* t	<i>bhrātā</i>	* t>θ	—	<i>brōþar</i> [bro:θar]	‘兄弟’
* t	<i>pitā</i>	* t>θ	θ>ð	<i>fadar</i> [faðar]	‘父親’

維納爾定律告訴我們，音段的變化有時跟超音段的條件也有密切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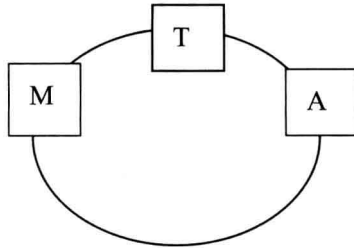
格林姆、格拉斯曼、維爾納等人音變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們的研究方法極大振奮了當時歐洲的學者們，新語法學派 (Neogrammarian) 就是其中之一。新語法學派由此提出了著名的規則音變論 (regularity hypothesis)，即語音變化是規則的，即使有例外也是受另外的規則支配；破壞規則音變的原因是類推或假借；音變只受語音條件制約，不受其他非語音因素的制約。規則音變奠定了歷史語言學的基礎。新語法學派曾用以下一些特點來區別語音演變跟其他的演變 (Hock 1991)：

語音演變	其他的演變
1. 規則	不規則
2. 同時影響具有相同語音條件的所有詞彙項目	可以不同時影響不同的詞彙項目
3. 機械的受語音條件支配	受心理原則支配
4. 不可觀察	可觀察
5. 是漸變的，無感覺的	可感覺的，突發的，大量的

親屬語言間同源詞的語音形式有如此系統的對應關係，語音演變又有如此精密的規律，這些都使得學者們去進一步探索對音變的解釋，即為什麼會發生音變，音變的機制到底是什麼。要全面瞭解早期印歐語學者的觀點還得從他們處理的材料說起。印歐語各大語族都有早期的歷史文獻，印度—伊朗 (Indo-Iranian) 語族、阿納多林 (Anatolian) 語族、希臘語族 (Greek)、意大利語族 (Italic) 等都有公元前的文獻，其他語族公元後的文獻也極為豐富，而且這些文獻都屬於拼音文字，所以比較各語言的早期文獻可以發現語音演變的軌跡，瓊斯 (William Jones) 正是通過比較早期梵文、希臘文、拉丁文、哥德文等文獻得出這些語言是親屬語言的推測。他在那篇標誌開啟歷史語言學的著名宣言書裏就

說：古老的梵文比希臘語、拉丁語更古老，形態、結構也更奇妙、完美（Jones 1786）。古典梵文精妙的形態變化，比如名詞有 8 種格形態，希臘語有 5 種，拉丁語是 6 種，而現代的英語只有 2 種。古典梵文有四套塞音：清不送氣、清送氣、濁不送氣、濁送氣，而現代印歐語裏很少有保留著四套塞音的語言。所以新語法學派前（pre-Neogrammarian）的歷史語言家常持語言衰變論（decay）的觀點。即語言從最早期的完美、精妙，逐漸衰變為殘缺、不純；語言就像生物一樣出生、成熟、衰老，然後死亡。格林姆定律的發現打破了衰變論的觀點。格林姆用 T (tenuis) 代表清不送氣塞音，A (aspirate) 代表送氣塞音和擦音（包括清濁），M (mediae) 代表濁不送氣塞音，上述的對應正好是一個循環，如圖 1.01：

圖 1.01



Tenuis “k” 變為日爾曼語的 aspirate “x/h”；aspirate “gh” 變為日爾曼語的 media “g”；media “g” 變為日爾曼語的 tenuis “k”。如果說語言演變的機制是衰變的，那就不可能有這種音變的循環。隨著格林姆定律、格拉斯曼定律、維爾納定律的發現，人們逐漸拋棄了衰變論。除了衰變論以外，早期的學者還提出過其他各種的解釋，甚至氣候、地形、海拔高度等也認為是音變的原因。不過這一時期最為著名的是新語法學派的“理想目標值飄移”學說（shift of the idealized ‘target’）。在 1880 年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Science 一文裏，新語法學派的代表人物保羅（Hermann Paul）指出每個人的發音不可能完全一樣，在一個目標值所允許的低度偏差（low-level deviations）的範圍裏是不會發生音變的，這種低度偏差範圍就好像一個掛鐘的形狀，如圖 1.02 時間 1。絕大多數的偏差非常靠近目標值，以至於只有受過訓練的語音學家才能分辨得出。當偏差飄移出這個允許的目標範圍，音變就開始了，如圖 1.02 時間 2。